

学者书库·论丛

XUEZHE
SHUKU
· LUN
CONG

孟子思想 评析与探源

翟廷晋 著

SHANGHAI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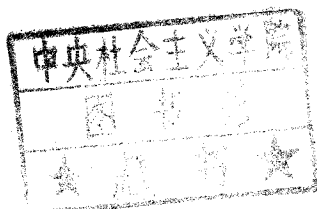
B222.5
8

• 学者书库 • 论丛 •

82718

孟子思想 评析与探源

DG12/16
翟廷晋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宗范
封面设计 闵 敏

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

翟廷晋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80515-130-8/B·37

定价: 6.00 元

06/2/16
序

冯 契

翟廷晋同志是一位沉潜笃实的学者，多年来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好学深思，孜孜不倦。他最近写成了《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一书，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读了全部书稿，觉得它具有几个显著的优点：一、作者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孟子的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全书十章，大致涵盖了孟子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历史背景。当前学术界还少见这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评述孟子思想的著作。二、本书在评析孟子思想时，对其精华与糟粕作了比较辩证的考察，既注意防止虚无主义态度，也注意防止良莠不分的全盘肯定的倾向。三、作者在对孟子思想的各方面作评述时，结合讨论了学术界的许多争论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些是独特的新见解。虽然这些看法和见解还可以继续讨论，但作者在提出时都是作了认真论证的，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要之，我认为这是一部花了辛勤劳动的力作，既体现了作者的深厚学力，也反映了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所以我很乐意把它推荐给读者。

作者在本书中正确地指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是孟子的弟子对老师一生思想言论的集中概括。”（第101—102页）这话真正抓住了孟子全部思想的“宗旨”或“要领”。性善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性源于天，是天所赋予，所以是善的。而人的任务就在于尽心、知性以知天，达到与天为一的境界。这样，性善说便把天道与人道、认识论与伦理学统一起来了。以此为基石，孟子建立其理想主义学说。在人格理想方面，他提出“人皆可

以为尧舜”的命题，以为只要把人性中的善端扩大发展，人人可以成为圣贤。在社会理想方面，他以为正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先王可以行“不忍人之政”，即实现尧舜之世那样的仁政、王道。可见，本书十章，虽涉及许多方面，抓住了“道性善、称尧舜”的主旨，便可“一以贯之”了。

当然，孟子的性善说和理想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理论。读者也许要问：一种唯心主义理论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封建统治者“独尊儒术”是一个原因。但只说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专制的统治者运用政治权力来提倡某种学说，往往只能使之成为僵死的教条，而并不能增强它的活力。归根到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植根现实的土壤和人民的实践之中，孟子哲学也不例外。就孟子本人参与的实践活动而言，他在政治上并不得意，被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他在教育实践中却是成功的，并且正是这种实践及其现实背景为他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土壤、养料。孟子和孔子一样，也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事。在他看来，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对学生要有爱心，要充分信任学生有求真(理)的倾向和为善(仁义)的可能，于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使人生理想化为现实。告子批评孟子以人性为仁义，犹如以杞柳为栲栳，把原材料(可能)和制成品(现实)混为一谈了。孟子反驳说：“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栲栳乎？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栲栳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栲栳，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孟子强调要顺杞柳之性而为栲栳，同样，只有顺着人性具有的可能性而促其发展，才能培养成居仁由义的理想人格。这种主张显然是从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此外，孟子还诉诸普遍存在的经验来论证人人有培养成为仁义之人的可能性，如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惻隐之心，仁之端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等等。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乃若其情，则

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认为，人性真实具有的材质，是可以经教化而发展为仁义，实现善的理想。这种见解确实包含有合理成分。虽然孟子从“可以为善”推论出“人性本善”，作了在逻辑上不能容许的跳跃，因而陷入唯心论去了。但剥去其唯心论，却可看到孟子哲学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有其根基，所以是有生命力的。

不过关于人性与仁义、材质与成品的关系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与孟子相对立，荀子主性恶说，以为斫木成器，是生于工人之伪（人为）；人性并无仁义，礼义法度之所以成的根据在于圣人的作为。后来王安石综合告子与孟、荀之说，以为“礼始于天而成于人”，树木必须“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绳墨”，才能成器；“然圣人舍木而不为器，舍马而不为驾者，固亦因其天资之材也”。按孟子一派学说，理想人格的培养在于“求放心”，“复其初”，即经教育修养以恢复人的本性。这是“复性”说。而按荀子一派学说，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积善成德”，“习以成性”，则“长迁而不反其初”。这是“成性”说，两说经过长期争论，后来由王夫之作了总结，认为《易传》所说的“继善成性”，就是人与天（自然）交互作用而“命日受、性日生”的过程。这可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在人性论上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当然，古代哲学家都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观点，不懂得人性是在社会关系中历史地形成发展的，因而都有其局限性。不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来回顾哲学史，对各种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有其根基的学说，经过分析批判，都应指出其包含有一定合理因素，构成理论发展中的一个个环节。

而为要对过去的哲学体系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批判，最要紧的是要善于抓住其宗旨。黄宗羲曾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读诸子百家之作，若不能得其人之宗旨，便难以入门，就像张骞初至西域，“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明

儒学案·凡例》),所以,我特别就“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语作了点说明和讨论,这对于本书读者或能有些帮助,即以此为之序。

1992年1月

前 言

孟子是战国中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高潮中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加之能言善辩，左右逢源，因而在和各派论敌的争辩中，捍卫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成为该学派的主要奠基人。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文化学术发展的高峰。当时这一领域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后来我国文化学术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文化学术领域中的成就，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自由争鸣的环境中取得的。虽然当时各家学派的见解和主张各有短长，当政者对之所作的取舍也因而异，但这一高潮的出现，则是各家学派共同创造的业绩。

当时，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经济主张，虽然不适宜于各诸侯国君以武力征伐来建立统一封建帝国的要求，但在统一的封建帝国建立之后，以“孔孟之道”为内容的儒家思想学说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居于独尊地位达二千余年之久。在这期间，孟子在儒家学派中取得了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他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一起，在正反两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构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主流。

由于数千年来儒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历史上的尊儒和反儒，常常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许多的重大政治斗争，也往往先从对待儒家态度的分歧开始。因而，直到现在，所谓儒家与政治密不可分，在不少人的思想中仍保留有深刻的影响。当然，学术

问题与政治问题有时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如果仅是在学术范围内产生分歧,最好不要轻易地提高到政治问题上去。在学术领域中,也有可能发生“尊儒”和“反儒”,即对儒学的评价产生较大分歧,但如果问题与政治没有直接联系,为了正确开展百家争鸣,暂不使用“尊儒”、“反儒”的用语为好。在对儒学的评价中产生了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就应当实事求是地开展讨论,甚至进行激烈争辩,共同的目的是科学地总结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以利于我们的国家更快地走向现代化。

最近几年,由于“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和改革开放的推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出现了一个高潮。其中谈论较多的,还是关于儒家学派的影响问题。在对儒学的评价中,争论较多的仍是关于该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问题,以及宋明以来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问题。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对儒家学派奠基人孟子的思想,虽然有所论及,并专门召开过学术讨论会,但宥于传统的“孔孟一体”的认识,对孟子本人的思想,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其实,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一方面是新旧社会制度的动荡空前激烈;另一方面,各家学派的争鸣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潮。孟子虽然站在儒家的立场,但他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游说诸侯以及和其他学派的争辩中,不得不回答各方面提出的新问题。所以孟子的思想和战国其他诸子一样,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

孟子一生讲得最多的是道德和仁义、性善和仁政等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干世主以化天下”,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从这个角度看,孟子的思想好像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但是,他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为了使人相信自己学说的正确,他对天道和入道,即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了广泛的联系,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从这个角度看,孟子的思想又是丰富多彩的。因而,需要从各个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才有可能窥其全貌,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就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古代人的思想比较浑括,不像现代人的思想那样,分门别类,条分缕析。但是,现代人的思想却又都可以从古代人那里找到它们的萌芽。就现存《孟子》一书的内容来看,似乎没有专门的篇幅来探讨认识论、审美观、价值观等问题,关于这些问题,都是在他探讨人性、道德、仁政等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甚至在同一段话中,就蕴含着几个方面的思想,致使引证原文时很难完全避免重复。实际上,这里正表现出了古人思想的浑括性,因而不能认为孟子的思想仅仅限于人性论、伦理观和仁政论。相反地,我们只有用现代人已经展开了思想脉络,回过头去分析解剖古人的思想,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地掌握其思想内涵。这就好像只有用解剖人体的钥匙去解剖猴体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地看到猴体器官所蕴含的萌芽状态的组织脉络一样。不过,至于如何具体对某一个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进行解剖分析,这又是一个需要具体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对孟子的思想,究竟应当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剖析才比较恰当,这应当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本书现有篇章的划分,只是一种很不成熟的尝试。

本书在从各个视角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不同层面评析的同时,还试图就各个不同领域以探求其思想的“源”。这里说的“源”是广义的,包括平常说的“源”和“流”两个方面,即指孟子思想的社会根源和学术渊源。孟子的思想虽然渊源于孔子等早期儒家的思想,但决定孟子思想本质的则是战国中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孔子等早期儒家的思想,对孟子思想的形成固然非常重要,因而,不探明其学术历史渊源就无法揭示出其来龙去脉;但是,这些终究只是他从自己先驱者那里接受过来的思想资料,欲揭示其思想的本质,最后仍得向其植根的战国中期的社会、经济、政治诸种关系中去探求。因而,本书在分别评析孟子各个领域的思想并探求的源流之前,首先对从春秋末期到战国中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状况作了一些必要的分析,试图首先揭示出,孟子的思想就是在这

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便下面具体从各个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其进行分析探源时能够在总体上加以把握。另外，在探求孟子思想的学术历史渊源时，也对孔子和有的非儒家人物与孟子有关的思想作了某些评述，试图以此揭示孟子对他的先驱者的思想取舍的标准，以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异同，用以阐明孟子的思想在儒家学派内部的共性和个性，以及他和其他学派的思想相互对立和相互渗透的情况。以上内容虽然占了一定的篇幅，但笔者认为，只有对孟子的思想进行全面评析并探明其源和流的前提下，才能把握其思想的实质及其当时所处的历史地位，以便今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之作出正确的批判和取舍。当然，这些只是笔者主观上的愿望，因限于理论水平和对史料掌握的限制，不能如愿的地方一定在所难免。诸多不妥之处，望能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孟子思想的时代背景	(1)
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经济变革与政治风云	(2)
第二节 战国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	(13)
第三节 孟子的身世与师承	(23)
第二章 天道观	(32)
第一节 孟子天道观中的神学残迹	(33)
第二节 孟子的“命运之天”与人的主观能动性	(44)
第三节 孟子天道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55)
第三章 认识论	(64)
第一节 先天的理性思维和后天的知识积累	(66)
第二节 对认识的层次和知行关系的探索	(75)
第三节 关于认识的检验问题	(86)
第四章 人性论	(92)
第一节 孟子人性论中反映出来的对人的重视	(94)
第二节 性善论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100)
第三节 孟子人性论的伦理化和理性化倾向	(107)

第五章 历史观	(118)
第一节 英雄史观.....	(121)
第二节 社会治乱交替论.....	(127)
第三节 社会分工论.....	(131)
第六章 伦理观	(146)
第一节 道德的先天起源与后天的修养.....	(146)
第二节 居仁由义——培养理想人格的基石.....	(156)
第三节 维护宗法纽带是孟子伦理观的核心.....	(166)
第七章 仁政论	(17)
第一节 孟子的仁政论是早期民本思想在战国中 期的新发展.....	(178)
第二节 孟子的仁政设想是带有理想色彩的超前 方案.....	(188)
第三节 孟子的仁政论要求适当限制君主的权力.....	(203)
第八章 审美观	(215)
第一节 孟子关于美善统一和美高于善的观点.....	(217)
第二节 美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227)
第三节 孟子对文学作品特点的分析.....	(233)
第九章 价值观	(241)
第一节 在培养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实现人的自身 价值.....	(244)
第二节 价值取向的多层次原则.....	(249)
第三节 人的价值是在矛盾冲突中实现的.....	(255)

第十章 名实观	(262)
第一节 孟子的正名思想.....	(264)
第二节 孟子论“知类”和“求故”.....	(267)
第三节 孟子论言、意、志.....	(276)
结束语	(281)
后 记	(294)

第一章 孟子思想的时代背景

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因为要正确分析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就必须把他的思想放到产生这种思想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否则就无法对之作出正确的评价。

人类认识的历史，有些类似一个具体的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过程；既不能割断，更不能颠倒。因而，要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是否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即是否对人类的认识史作出贡献，就不能从今天的历史条件来要求他，而只能看他比他的前人提出了哪些新的认识。否则，就是苛求于古人，就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今天研究孟子的思想，主要依据的史料仍然是历来人们研究孟子的思想所依据的那部七篇十四卷的《孟子》。就史料本身来说，《孟子》这部书在先秦诸子的遗著中是真实性较强的著作之一。史料本身可信的程度，固然是决定能否对作者的思想作出正确评价的先决条件之一，但这还不是唯一的条件，同时还决定于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对该思想家所处的时代了解的程度。

历史上的思想家所处的社会实际和他的实践活动，是形成他的思想的“源”；他所依据的先驱思想家的思想资料，是形成他的思想的“流”。对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形成过程来说，“源”比“流”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当时社会的经济变革和政治斗争，以及孟子在这些变革和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是他的思想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形成的社会根源;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水平,和孟子对当时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的程度,以及他在思维活动中受到的锻炼,是他的思想形成的认识根源。还有,他当时所受的教育,和各个学派在相互斗争和融合中对他产生的影响,也对他的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下面着重对孟子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即他的思想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以及他与早期儒家的师承关系作一些考察分析,至于当时各个学派在相互斗争和融合中对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将在以后各章分析评价孟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时加以论及。

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经济变革与政治风云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革故鼎新的转变时期。这一点,几乎是所有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都承认的。但是,这次大转变究竟是一次什么性质的转变,史学家们的认识就有分歧了,从而,在古史分期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有的认为,是封建社会制度本身的一次转变,即由封建的领主制转变为封建地主制;也有的认为,是奴隶社会制度本身的一次转变,即由不发达的奴隶制转变为发达的奴隶制。由于在社会历史分期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因而在分析评价当时思想家们的思想时,就必然会产生分歧。特别对他们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更是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本书在分析评价孟子的思想时,则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的上限就是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即春秋时期的上限),下限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即战国时期的下限),而是说这一过渡大体上是在从春秋到战国这一历史时期完成的。

历史时期的划分不是像刀切一样整齐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

的过渡是交错进行的。中国古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轨迹，可以用一些有象征性的历史事件作为这一转变的标志。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税亩”（“初税亩”），即国家开始向土地私有者征税，标志着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幼芽已在奴隶制社会内部破土而出，并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后来，到了公元前338年，商鞅在秦国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则标志着在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而政治影响较大的诸侯国最后完成了由奴隶主阶级向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转移。这一各诸侯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前后共经历了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接着，由封建割据的诸侯国到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又经历了一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才宣告完成。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正是各主要诸侯国大体上已经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当时，摆在各大国新掌权的封建地主阶级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巩固新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增强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图最后战胜别的国家，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后世史家所以称这一时期为“战国”时期，正因为这一时期在各大诸侯国之间最突出的是“战争”。因而，对当时各家学派、包括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提出的思想和主张，都需要放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否则就无法对他们的思想作出正确的评价。

周王朝建立后，使原来以华夏地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奴隶制社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因而使社会出现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来的生产关系又逐渐地不能与之相适应，新的社会矛盾产生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从生产工具改变开始的。决定社会制度发生变化的最终原因，不在于人们生产什么，而在于用什么工具进行生产。到了春秋时期，铁制工具和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重大变化。因为“铁使更大面积的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坚固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